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陰性主權：近代中國對外關係的起點

doi:10.30390/ISC.199511_34(11).0003

問題與研究, 34(11), 1995

Wenti Yu Yanjiu, 34(11), 1995

作者/Author：石之瑜

頁數/Page：24-38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1995/11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199511_34\(11\).0003](http://dx.doi.org/10.30390/ISC.199511_34(11).0003)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陰性主權：近代中國對外關係的起點

石之瑜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壹、關於主權的性格

西方政治學界近來對於主權概念迭有探討，雖然角度與立場或有差異，傳達出來的訊息則一，簡言之，主權的概念是歷史特定時期的產物，加上人爲有意識的建構，才變成了今天大家習以爲常的思考起點。^①依此推論，主權國家就不只是政治學者研究的客觀對象，而是有利於某一些人，但不利於另外一些人的意識型態。這些來自西方的自我檢討，多少點出了近代中國在外交活動中所遭遇的困窘。對中國而言，主權概念的發生，更顯而易見地是帶著被強迫的性質，因此以主權國家的名義來整合中國人，不僅只能有利於部分中國人，而不利於另一部分中國人，更值得提出的則是，在與西方文明互動時去採納西方文明的出發點，勢必會置中國文明於一種落後、卑微的地位。

從近代中國經驗裡似乎可以看出，主權依其所在地區文化與政治社會狀況的差異，而有不同的個性，與西方古典學說中那種基於地理空間的、可以客觀認定的、不受文化羈絆的抽象主權，並不相同。^②比如說，主權可以有其積極的一面，也可以有其消極的一面。積極主權表現成人們運用主權攫取好處，這些好處可以包括領土的控制、反對勢力的鎮壓、國際援助的取得等。消極主權表現成對外的孤立、對內的放縱、或多方面的中立。人們是否在大量運用主權的名義，從事資源配置的活動，就決定了一個主權的積極程度，這應當與當時世界政治的氣氛、內在的社會心情、經濟狀況、與政治現實有關。^③強國不一定積極，積極主權也不一定是永久性格，對甲國積極不一定會表示對乙國也積極，對甲事件積極不一定會表示對乙事件也積極。換言之，主權性格不是國家行動的起點，而是國家行動的終點。當人們要以主權名義活動時，他們的社會心情早已決定好主權者的方向了。

殖民地獨立之後的新興國家主權，又與十五世紀創造主權概念的歐洲國家主權十

註① 例見Cynthia Weber, *Simulating Sovereignty: Intervention, the State and Symbolic Ex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Jens Bartelson, *A Genealogy Of Sovereign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註② 抽象主權反映的是科學的矯飾，見Jim George, *Discourses of Global Politics: A Critical (Re)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oulder: Lynne Rienner, 1994).

註③ 有人稱此爲內向或外向，見Jack Holm, *Mood / Interest Theory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Lexington: 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 1985).

分不同。④中國曾受各國瓜分其大部分領土，也經歷過門戶開放政策，所以當辛亥革命建立了主權中國時，沒有人能忽略主權中國的脆弱地位，除了中國人對自己的主權沒信心，每逢帝國主義勢力予取予求的干涉行徑，或忍氣吞聲，或視為當然之外，就連外在的各國，也都將中國當成是落後、脆弱、依賴性強的對象。照強弱的判定，主權的個性又似乎可以區分成陰性主權與陽性主權，他們的自信心與互相尊重程度有所不同。

陰性主權表現成防衛性的、依賴的、靜態的、靠原始材料與人力資源的、情緒的等特質；陽性主權表現成強勢的、獨立的、動態的、技術與智慧的、理性的等特質。大凡歐洲文明蔓延建立的國家屬於陽性主權，而亞、非、拉等後殖民地地區的國家屬於陰性主權。⑤主權的陰陽組成，不像前述關於積極性的程度，那是受個別人物、具體政策時空所影響，而是依照一國在殖民與後殖民的國際結構中所處位置來決定，反映出各主權之下的人民，集體心態上的自我定位與相互定位。陽性主權下的人們當然也可能充滿情緒，追求征服與擴張興奮莫名，但是這種情緒符合西方文明對主權的期待與描述，反而成了理所當然的行為，倒是防衛不力的地區，包括近代中國，看起來如此地幼稚與卑微。

本文旨在說明，近代中國作為一個後殖民的陰性主權，受到認知與情感上的限制，只有在其外交活動能滿足西方國家對陰性主權的期待時，才能獲得援助。而西方期待於近代中國的，恰是一個弱勢受欺、依賴求助的對象，太強的愛國主義或天下共主姿態，多半引起西洋各國入侵的慾望與證明自己先進地位的心理需要，反而讓他們享受血腥的征服。

貳、近代中國對西方的反彈

西方帝國主義來到中國，經過一連串的砲艦外交攻勢，取得了條約權與條約港，深入中國內部經商、傳教，不得不引起中國領導階層與社會知識菁英對傳統中華文化的反思。早先的衝擊或許可以透過羈縻的手段加以化解，然而西潮東來，波波相連，直至甲午之戰敗給日本後，引起各國爭相在華建立勢力範圍，列強瓜分中國之勢儼然形成。自鴉片戰敗五十餘年以來，中國從天下共主淪為次殖民地，對於當時的人而言，撞擊不可謂不大。

中國人對西洋殖民勢力的入侵，有兩種不同的抗拒角度。一個是站在中華文化的立場，拒斥西洋文明；另一個是站在中國主權的立場，保障領土的完整。文明戰場上的反彈，紮根於悠久的文化傳承，則中國的特殊性與優越性不證自明，因而對待西洋的態度，是得過且過，能禁則禁，但求有一個門戶開放的限度。主權戰場上的反彈，

註④ 這是一個文化問題，而非主權問題，見Kwame Anthony Appiah, *In My Father's Hous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註⑤ 這也是文化建構的問題，不是主權問題，見Edward Said, *Cultural and Imperialism* (New York: Vintage Book, 1993).

則植基於朝廷所能管轄的地理空間，蓋主權的範圍是可以客觀劃定的，有多少實力就可以表現出有多大的主權能力，故持這個角度的人，在態度上比較積極，努力的目標也比較具體。

清朝對西方殖民勢力的反彈，只能站在文明的角度，這是認知上的必然。蓋其時並無所謂主權中國存在，在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之後，朝廷強硬之士如奕訢一改其態度，開始全力推動洋務，鼓吹自強。中國自此擺脫純然防堵的消極作風，但心態上仍不脫「師夷長技以制夷」，或「中體西用」的深層驕傲。^⑥湘軍、淮軍的興起，擊敗了打著西洋宗教為旗號的太平天國，算是一次內在的文明自新運動，這些鄉野團練領袖均是深諳孔孟之道的儒者，立刻為朝廷重用來處理洋務，然而，辦洋務的人無論多麼心繫中華文化，卻很難不表現成是在侵蝕中華文化。不少清議之士雖是滿人，反而卻振振有辭地批判洋務運動。後來，不僅自強運動失敗，在甲午戰敗之後的維新運動，也如曇花一現。就是辦洋務的人自己也對泰西文化充滿戒懼，曾紀澤使歐前的一段話，透露了中國文明的無奈與退縮心態。他告訴法蘭亭：

……中國公使眷屬，祇可間與西國女賓往來，不必與男賓通拜，尤不肯與男賓通宴。即偶有公使至好朋友，可使妻女出見者，亦不過遙立一揖，不肯行握手之禮。中西和好雖殷，然此一端，卻繫中國名教悠關，不必捨中華之禮，從泰西之禮也……則將出中國公使挈眷出洋者，不至視為畏途。^⑦

自強運動與維新運動遭到中國內部的抵制與詆毀，但卻為在華洋人所關切。他們一方面庇護維新運動的領袖康有為與梁啟超，並殷切關心遭到軟禁的光緒皇帝，且反對朝廷另立大阿哥的計畫。朝廷至此正累積數十年的怨氣，與民間排洋教、殺毛子的義和團運動上下匯流，^⑧對內要抓光緒、拿李鴻章，對外則向各國宣戰，完全違悖主權世界裡的思考邏輯，所強調者是跨國界的天下民心，所對抗者是不分畛域的所有外來之人。義和團之亂是中國天朝最後一次站在文明立場的反彈。爾後關於洋人之報導，由負面而正面，由不屑而崇拜。以美國為例，在拳亂之前，說美國「君臣有夜郎自大之意」，謂「美之大勢，三十年內不有外侮，必有內憂」，^⑨但在庚子辛丑和約之後，則稱許「美國實居易於勝人之地，不易為他國所轄制，其位置在西半球之中心，實可稱為地球萬國中央之國，真可握天下中樞之政權，與中華之稱為中國，有異也」。^⑩

從中國文明地位之退卻，產生了上述對泰西文明的幻覺，不過，站在中國文明位置的反彈，則也開始轉移到了以主權為出發點的角度。在甫失去文明位置的中國，很難找到在涉外事件上處理問題的參考依據，故也難怪日、俄戰爭在滿洲進行時，提供戰場的中國方面只能宣布中立。日、俄選擇在滿洲交戰，顯示中國只是雙方爭奪的土

註⑥ 魏源的「師夷長技以制夷」及後張之洞的「中體西用」顯然都是在處理文明衝突的問題，而不是提倡愛國主義。

註⑦ 曾紀澤與李鳳苞，使歐日記（台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民國七十七年），頁三五。

註⑧ 可參見劉彥，中國近時外交史（台北縣：文海出版社，民國七十二年）；李劍農，最近三十年中國政治史（上海：太平洋，民國十九年）。

註⑨ 習賢德，清末中文報刊呈現的美國形象（台北：文展出版社，民國八十年），頁七九。

註⑩ 同前註，頁六八。

地，不具備主權意義，而西洋各國亦紛紛建議清廷應該保持中立，^①完全不思及中國在沒有主權屏障的情況之下，何來中立的立場？辛亥革命恰是在日、俄戰後五年爆發，中國主權的建立，是在各國藐視中國主權，而中國人既不懂何為主權，又無能力維護主權的歷史脈絡裡發生的。不過，中華民國的誕生，使中國人起碼有了一個具體的外交目標——維護主權，雖然這個目標本身就已經承認了中國的卑微地位。

主權名義的出現，確實為憂國憂民的社會菁英帶來一線希望，但他們立刻發現，民初的紛擾與割據，其實已為前殖民勢力鞏固強化彼等在華既得利益，提供了更多的契機。大量的對民國力量不振的焦慮，於袁世凱接納日本二十一條要求時爆發。革命黨人與軍閥為了爭取外來奧援，競相向前殖民勢力作出損及主權的讓步，^②不僅中國政治人物不以為罪大惡極，就連精通主權原理的泰西諸國，也不曾因此而引起他們擔心主權原則的被破壞，顯然他們從來沒有把主權中國當成一個典型的主權在看待。直到歐戰結束，中國以戰勝者姿態而被迫要割讓山東半島，才引起了五四愛國運動，算是站在主權立場反彈西洋力量的高峰。值得注意的是，自民國四年以來的群眾運動，常是針對著東洋的日本，只不過當時日本的對外政策，也仍是在西洋的主權規則之下進行的。

相較於文明角度的反彈，那是一個由弱而強而崩潰的經歷，主權立場的反彈是由強而弱。民國八年時的北洋政府基本上順從五四運動的呼聲，拒簽巴黎和約，但自此以往，中國主要政治勢力在遭逢外侮時，多以訴諸國際的手段來解決。像二十一條要求與山東問題，中國是靠一九二一年的華盛頓公約九國共同簽字來化解；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中國最後選擇訴諸國際聯盟。政府雖然認識到廢除不平等條約是當務之急，但對於二〇年代中期各地發生外國駐軍射殺中國學生的事，基本上束手無策，但求聯合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唯民間的愛國群眾運動則層出不窮，有稱此為革命外交者，並率先收回九江與漢口租界。^③中國以弱者姿態出現的時候，則亦能中規中矩收回若干關稅權，但真正廢除不平等條約，則是等到日本大舉侵華，與歐戰爆發之後的事了。

叁、抗戰中國的主權性質

當民間一致要求恢復國權，抵禦外侮之際，國民政府礙於軍事準備不足，且寄望國際干預不成，終與日本簽下塘沽協定，冀東各地成為日本進攻河北的「非戰區」。^④中

註① 見劉彥，*中國外交史*（台北：三民書局，民國六十二年），頁二八三；郭廷以，*近代中國史事日誌*，頁一二〇八～一二〇九。

註② 見Marius B. Jansen, *The Japanese and Sun Yat-se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0), pp.188~193.

註③ 見李恩涵，*北伐前後的革命外交*（一九二五～一九三一）（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八十二年）。

註④ 胡秋原，*近百年來中外關係*（台北：學術出版社，民國五十九年），頁二〇四。

國國權不彰，卻受各國忽略，不但國聯束手無策，就是華盛頓公約組織都莫能奈何日本。歐美當時力主姑息，不願與日本發生衝突，即至中國宣布抗戰之後，仍勸中國能對日本妥協，尤有甚者，英法兩國甚且屈從日本壓力，法國先停止中越交通，英國繼而封鎖滇緬路段。英國的立場在九一八之後就很明顯，即願意承認日本在華利益，只要能維持門戶開放政策，確保英國既得利益即可。為此，英國倒是曾建議日本能顧及中國的顏面，在主權名義上不必多所要求。^⑮

英國的想法很難謂之為不義，蓋國民政府的態度亦復如此，其外交方針一言以蔽之，就是維護中國的主權。但是這個原則其實仍有極大彈性，因為抗戰初期，中國的作戰目標並不具體，所以並未對停戰設下任何先決條件，而且小心謹慎，不以否定日本在華利益為目標。七七事變之後十天，蔣介石委員長在廬山指出，和平解決的關鍵是維持冀察行政組織及人事，到民國二十七年國民黨通過抗戰建國綱領，唯一具體的內容，是表示要「否認及取消日本在中國領土內以武力造成的一切政治組織及其對外行為」。^⑯這個立場當然是在針對汪精衛政府，至於是否包括解散滿洲國，恐怕都是可以談的事。換言之，中國的戰爭目標，可能只是要恢復七七之前的現狀再說，故建議與日本「謀合理之解決」，^⑰語焉不詳，保持彈性。事實上，七七之後雙方仍間接進行談判，^⑱直到歐戰爆發，國民政府才完全關閉談判大門。^⑲

無論是國際或中國政府自己對於中國的國權，都不是抱著斬釘截鐵的態度。一方面，中國的主權不等同於西洋意義中的主權，所以淪為國際間可以談判妥協的對象，維護中國主權的完整從來不是保衛主權世界的重點，對中國主權的侵犯也不被當成一般意義中對主權的否定，後殖民時期的主權中國只能是一個落後而卑微的主權。另一方面，中國政府自己想要的，也不是真正能透過國權來控制、享受、運用社會資源，充其量只追求行政管轄權的完整，^⑳所以塘沽協定是可以接受的，但汪精衛政權則破壞了行政權的完整，故不能接受。中國外交上對於主權的詮釋是最低限度的，對於日本在華透過實際經濟組織與條約所掌控的中國經、社國脈，似乎並非國民政府立刻要取回的重點項目。

由於日本的戰略是速戰速決，所以相對地中國的對策是誘敵深入，中國陰性主權的特點在此表露無遺。國民政府初期的抗戰，是站在一個弱者的姿態，採撤退的戰略，運用中國的自然環境優勢，而不是組織動員戰軍事科技：

在第一期作戰的時候，是在交通便利的地帶作戰，他的陸海軍和機械化部隊，可以進出運用，縱橫自如。在這樣的戰場上，作戰了十八個月之久，他不但不能使我們失敗，而且我還愈戰愈精，愈戰愈強。此後第二期作戰，進入

註⑮ 傅啟學，*中國外交史*（台北：傅啟學，民國四十六年），頁五四七～五四九。

註⑯ 同前註，頁五三六。

註⑰ 國民政府自衛抗戰聲明書。

註⑱ 見吳湘湘，*第二次中日戰爭史*（台北：天下，民國六十二年），頁四二七～四三一。

註⑲ 見蔣緯國，*國民革命史*（台北：黎明出版社，民國六十八年），頁七九。

註⑳ 所以重點在取銷非法組織，對於滿洲國則不能要求中國承認，見傅啟學，*前揭書*，頁五三三。

地形複雜，山岳沙漠交錯無際，交通給養，皆極不便的戰場，他的技倆，更將無所施展。^①

這種仰賴「自然」的抵抗，同時又配合著人民心甘情願的犧牲，或謂抗戰初期的外交，是「以血肉犧牲為外交」，^②蔣委員長曾說明了犧牲的重要性，可是這個重要性僅止於戰爭觀點，其與國權恢復的關聯，並不是直接而明顯的：

……他現在雖然占據了我們太原、濟南、上海、杭州，甚至公然侵占我們南京，我們仍不屈服，仍要抗戰下去，他這個速戰速決的政略，就完全被我們打破。我們六個月來，犧牲這許多官兵和人民的生命財產，所爭的就是在此。^③

換言之，人民的犧牲未必是一個擋不住的災難，而是一個有意識的選擇，因此主權中國展現自我的方式，不是奮起對抗與征服，而是消耗、吸納、分散，於是而有黃河決堤以阻日軍的自我淹沒作法，或撤遷大後方時，一併拆除軌道以防日軍尾隨深入的對策。

其結果，抗戰仰賴的是民心築成的長城，^④故是情感的投入，不是科學的分析，是以放棄對地理空間的占有，來凸顯民心不會受占領者支配的自信，這可以說是後殖民國家對主權無奈地新詮釋，也只有本來就是國權不彰的區域，如中國、印度、越南等地才用得上的方法，乃靠著情感上的執著，才有可能對於鉅大的犧牲，抱著堅忍的態度。在印度有後來展現的不合作運動，再後又有越南與法、美帝國主義長期的浴血作戰，都表現了陰性主權以退為進的毅力與執著，這是講求冷靜計算的西洋主權所不能完全理解的。在歐洲，法國的抵抗就迅速瓦解，英國與美國和德、義都採取出擊的戰略，甚至後來還要求中國亦能向日本出擊，這種對自己主權特性認知上的差異，不僅可能影響對各國軍事實力的評估，也會限制各國因應主權挑戰時的心理傾向，是和或戰，是退或進。

中國主權的陰性面，也在各種訴諸國際援助的聲明中表現出來。早在華盛頓公約時期，中國就已承認自己國權不彰，非訴諸西洋列強的干預不能保中國。^⑤因而與當時提倡綏靖政策的英國，與嚴守中立的美國不同。英、美兩國的假設，顯然是他們本來就可以獨立存在，即使不問世事，亦不損及其主權地位。中國當然沒有這種奢侈的心態，否則必然重蹈各國瓜分中國的危機。對西洋國家而言，只有核心主權國家的完整性受到威脅或破壞時，才會讓他們感到有危機的存在，像中國、朝鮮、波蘭、阿比西尼亞這種歷史上的殖民對象，其主權受到多少尊重，實在不能用來隱喻西洋核心主權國家的主權地位是否也會受到折損。

中國既不同於西方，就只能積極向外找尋值得依賴的對象，抗戰建國綱領的外交原則就將這個必欲拉下各國而後已的心態，表露無遺：

一、要有獨立自主精神，聯合世界上同情於我國之國家與民族，為世界之和

註① 傅啟學，前揭書，頁五五九。

註② 胡秋原，前揭書，頁二二六。

註③ 傅啟學，前揭書，頁五五三。

註④ 吳湘湘，前揭書，頁四〇二。

註⑤ 張忠絨，中華民國外交史（一）（台北，正中書局，民國四十二年），頁三六五。

平正義，共同奮鬥。

二、對於國際和平機構，及保障國際和平之公約，盡力維護，並充實其權威。

三、聯合一切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之勢力，制止日本侵略，樹立並保障東亞之永久和平。

四、對於世界現存各國之友誼，當益求增進，以擴大對我之同情。^{②6}

嚴格說，綱領表達的只是中國外交的態度，並非對某一類問題的具體主張。易言之，當時中國的態度，就是國際化，正體現了弱主權與強主權的本質差異。

在抗日戰爭初期，國聯欲透過華盛頓公約調處同為公約國的日本與中國。中國的立場是依賴國際，故指稱「日政府又謂應由中日兩國單獨進行解決，然此種解決方法，決不信其能成立公正而垂久之解決也」。^{②7}中國於是企圖進一步說服各國，他們與中國其實共在一條船上：

目前中日衝突，不獨使各國權利，且使各國物質利益，皆受不良影響，此亦為無可否認者。第三國人民有因此喪生者，更有因此受絕大危險者，國際交通為之阻塞，第三國人民產業遭其損害，國際貿易被其擾亂而受損失；而各國人民且因此發生恐慌憤懣之情緒，舉世亦莫不因此起惶慮不寧之感想焉。^{②8}

上述主權中國之論辯角度透露出兩個訊息，證實了後殖民國家的主權本質是迥然不同的。首先，顯然國民政府認為，參與華盛頓公約的其他國家人民，包括美、英、比、法、義、葡、南非、澳洲、加、印度、紐、玻利維亞、墨、丹諸國，不能像中國人民一樣地被要求犧牲，他們點點滴滴的具體利益都要維護，故承認了中國人民在中國主權之下的權利地位，本當不如西洋人民。其次，中國又似乎假設，西洋政府會聽懂並被中國的辯論所打動，故西洋政府一定也認為他們自己的人民比中國人民更高一級。無論國民政府的說詞是否在否定中國主權的尊嚴，它的說法絕對符合中國自認必須仰賴國際的這種脆弱心情。

抗戰初期態度首先出現轉變的是美國，羅斯福總統就對中立的政策提出質疑，相信在世界和平與非戰狀態迭遭破壞之下，美國也難倖免。美國一方面不願直接涉入，但另一方面又想有所作為，除了提供中國貸款，並第一個主動承諾取銷美國在華特權。同時美國也對日本實施禁運，並堅持對日本在華作為採取不承認主義。美國的姿態則儼然高高在上，因為它自認有許多方式可以表達美國人民的普遍情緒，展現了一種有選擇能力的獨立主權心態，^{②9}剛好與中國期望於美國所能扮演的領導角色相契合，中國對美國的能力與意願都有超高期待：

……美國政府可先邀請主要關係國家，在華盛頓或其它處舉行會議，如日本拒絕參加，則美國政府更有正當理由，將[弱化日本戰鬥力]辦法加諸此種頑抗之國家，此種辦法縱僅經過短時間之施行，必將使日本幡然省悟，而最

註^{②6} 見傅啟學，前揭書，頁五三六。

註^{②7} 傅啟學，前揭書，頁五三九。

註^{②8} 傅啟學，前揭書，頁五三八。

註^{②9} 郭榮趙（編譯），蔣委員長與羅斯福總統戰時通訊（台北：幼獅，民國六十七年），頁三九。

後必當促其接受舉行會議之建議。

……日本縱屬頑強狂妄，縱欲鋌而走險，而美國之威望實力與資源，已足使美方之態度與行動構成日本所必須顧慮之因素，確信美國艦隊之由大西洋調駐太平洋，已使日本對於其前途加以深長及慎重之思慮。日本現在所尊重的唯一國家厥為美國，美國之警告，日本決不能充耳不聞。

閣下既為如此偉大國家之元首，則一切遠東問題并及其他世界問題，其解決之樞紐，實在閣下掌握中也。^⑩

中國已經委身相許，現在必須了解一下美國眼中的中國，代表了什麼意義，才能理解美國的反應。

肆、主權中國作為美國的對象

從美國人接觸中國開始，一直到今天，他們對於中國始終抱持著一份憧憬，就好像中國大陸是美國價值可以播撒的原始大地。這種心境受到教會的活動影響極深。自從清末以來，美國教會最主要的國家對象就是中國。傳教士有著悲天憫人的慈愛心，他們來到中國是要拯救中國人，甚至到了一九六〇年代早期，仍有教科書描述中國人坐在死亡的黑暗陰影中。^⑪傳教士是宗教的教義中替自己的先進地位找證據，他們施捨與犧牲的精神完成了作為救世者的自我要求，與他們共赴中國或在中國出生、成長的孩子們，則成了冷戰時期叱吒風雲的中國通，他們對中國的情感不言可喻，容或對時局的評價與對策會因為黨派屬性或意識型態不同，有的表現成親毛親共，有的則是愛之深責之切，但大體而言，他們共同的出發點是中國的落後。中國人如果高舉主權大旗不讓美國幫忙，一定就有人笑他不自量力，氣他不識抬舉，或同情他情有可原。無論如何，多數人相信，中國人需要美國人的幫忙。（當然，美國人也需要一個待援的中國來凸顯他們所處的先進位置。）

美國人到中國的原始意圖是商業的，在鴉片戰爭後，美國趁虛而入與清廷簽下望廈條約，所圖的雖然都是中國人眼中的小利小害，但顯然並沒有關於中、美文明地位孰尊孰卑的前提在內，相反地，還有關於中國政府如何幫助美僑的規定：「中國政府有責任保護美國在華公民的生命財產」，「中國承認美國商船在中國與他國交戰時的中立權利」，「中國有救助美船在中國沿海遭難的責任」。^⑫可以說，中、美的第一次接觸，中國是個完整的、有管轄能力的對象。

由於美國在華沒有領土野心或戰略考慮，故不似英、法經營得那麼積極，面對各國在甲午戰後紛紛在中國劃割勢力範圍，美國認識到中國正面臨被瓜分的危機。在當時，中國已經幾乎淪為一塊地理名詞，「各國並且對中國存著欲望，要拿中國供他們

註⑩ 郭榮趙，前揭書，頁四〇。

註⑪ 見Richard Madsen, *China and the American Drea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p.30.

註⑫ 李定一，*中美早期外交史*（台北：傳記文學，民國六十七年），頁一七四。

挾注，去維持歐洲不安定的政治均勢……一遇爆發的機會，就想著手瓜分。」³³美國國務卿海約翰提出「門戶開放」原則，希望維持中國的完整，使免於瓜分。在海氏與各國的往來函件中，有些用詞特別值得注意，因為這些用詞反映了泰西諸國眼中的中國為何物。比如，英國對美國的覆函中用到「中國內的所有土地」（all territory in China），而非「中國的所有土地」（all territory of China），³⁴一字之差，中國就不是主權者，而是靜態的物。

門戶開放政策的確使得中國免於遭到瓜分，不過，中國人事後想來未必感激美國，可能總覺得美國是在為著自己的商業利益著想，不值得謝。但是卻也必須承認，人們心態上的調整，不像歷史學家的後見之明那樣乾淨清爽，美國在事實上幫助了中國，再加上美國並未在中國參與勢力範圍之劃分，當然會讓中國人在民國建立之後繼續對美國抱著期望。同樣地，美國也必然認識到自己拯救了中國，在情感上就不可能像其它西洋勢力，只是將中國純粹當成一個靜態的物。拳亂之際，海約翰就希望能有中國之內某些地方當局出面代表中國人民，而非由列強逕行干預。他的立場首先是要維持中國領土主權與行政權的完整（但同時也表現了中國的無能）：

……吾人認為北京目前幾已陷入無政府狀態，因而權力及責任實際均已委諸地方當局之手……吾人視彼等代表中國人民，並願與彼等維持和平及友好。……即與其它各國採取共同行動：一、開放與北京之通訊並拯救在危難中之美國官員、傳教士及其他美國人民；二、對在中國其它各地美國人民之生命財產，儘量予以一切可能之保護；三、維護並保護一切美國合法利益；四、協助防止叛亂蔓延至中國其它省份，並防止此類災害之再度爆發……，美國政府之政策仍為：尋求一項能以導致中國永久安寧和平，維持中國領土及行政完整，維護一切條約及國際法對友邦所保證之權益，並在中國境內一切地方保障世界各國均等公平貿易原則之途徑。³⁵

與望廈條約相較，保護美國人的責任已經不能再交給中國，而必須暫時由各國共同承擔，但美國期待中國自己建立一個可以依國際法行事的完整主權政府，這個立場是否是出於自私並不重要，因為中、美兩國人民的情感基礎已經逐漸與其他國家區隔開了，中國人對美國的能力與意願懂得依賴，³⁶美國人也對中國的落後與衰敗衷心同情。這是中華民國建立之前的次殖民經驗就已經鋪陳的心理基礎。

中華民國肇建，美國國會率先祝賀，在各國均仍猶疑之際，美國政府決定順應民意，並阻擋各國向臨時政府予取予求，而於民國二年五月二日正式送達國書，自是美國並未藉軍閥內戰大舉介入，甚至在五卅慘案之後表示隨時願意交還中國的關稅權。

註³³ 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第一編，第六冊，頁一四七，引於陳志奇，中國外交史（台北：國立編譯館主編，天南，民國八十二年），頁九八九。

註³⁴ 例見同前註，頁九九三，九九四。

註³⁵ 同前註，頁九九八。

註³⁶ 民國之後第一次，是歐戰爆發，中國宣布中立，首先要求美國出面向各國表示尊重中國的中立。見張忠絳，前揭書，頁一二三。

俟日本發動九一八，美國國務卿史汀生發表不承認主義，宣布美國不承認任何「損及中國主權獨立，或領土及行政之完整」的條約。^⑭史氏後來指出：

……相信中國人民自有其光明之前途。並相信以公正忍耐及相互好感諸原則，與中國人民相周旋，必能得最好之成功。吾人深悉彼國政治家發展其國家與政府所負責任之重大。彼國進步之遲滯，與其締造負責政府之困難，早為海約翰氏及休斯氏及其他當代人物所料及；因此種種阻礙，即門戶開放主義所為籌劃以應之者也……假中國以時日，俾成就其發展。吾人實表示贊同，且將準備即以為吾國將來之政策。^⑮

中、美之間特殊的主權關係，其實是不能與美國的善意、關懷、自信、憐憫等情感分開的。對美國人而言，中國人若能建立一個像美國一樣崇尚自由民主價值的社會，有一個理性科學的主權政府，則就是美國人的歷史成就。有的美國人瞧不起中國，卑視之，其他美國人卻學得為中國的苦難抱不平，為之憂愁。不論是睥睨或關心，卻又都似乎共同決定了主權中國的落後位置，這是美國傳教與拓荒精神所自己體會不出來的文明傲慢。

當然，美國人的傲慢並不是因為要幫中國建立主權才產生的，也與美國資本主義發展迅速，亟須海外市場及廉價勞工有關。眾所週知，在資本主義之下，擁有資本的人同時可以擁有勞工僱用的權力，所以資本家盱衡時局，跨國界地找尋最適用的工人。相反地，提供工人的社區或社會，不能決定自己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的位置，工人一旦受僱於工廠，脫離了傳統經濟部門，就不得不依附於資本來生存，也從而決定了他們身處邊陲的附屬地位。某些傳統經濟部門仰賴輸出健康的勞力，來換取他們定期寄回的微薄薪資，承受因為經濟發展差距拉大而帶來的低下地位，但除了繼續以輸出勞力維生之外，別無他法，形成資本家與勞工之間因為僱傭關係、富裕程度、出生家世方面的差別所塑造的不平等關係。

美國因其調解英法聯軍有功，獲同意在中國招募華工至美國工作。華工進入美國之後帶來許多社會效應。首先，華工們聚居生活，並不融入美國社會，對美國之為民族大熔爐之特性難以適應，容易成為美國社會顯而易見，指指點點的對象，其次，華人遠赴重洋多少有冒險性質，故難免夾雜犯科之徒，抵美後各種不良習慣進入眼簾。再其次，多數華工工作勤奮，生活節儉，常為僱主所喜，致造成美國失業工人之不滿。這種種現象逐漸累積匯流成一股排華風潮，黃禍之說不徑而走，造成赴美華工、留學遊歷之人經常受到屈辱，有遭遣返者，投海自盡者，病死者，^⑯主權中國依例無能過問，任憑美國各界透過傳媒醜化華人，除輸出華工最頻的廣東地區發起抵制美貨外，其他地區反應冷淡。梁啟超曾大加批判：

庚子春，檀香山以治疫之故，焚燒人民財產數百萬，而吾華商居大半焉。初焚時，檀政府擔任賠償，乃至今三年，毫無影響……全檀僑民，鵠立以待酒轍之救，乃最後為某議員所沮尼，竟於豫算案內除去此項……吾華商之數百

註⑭ 傅啟學，前揭書，頁四三五。

註⑮ 同前註，頁四三八。

註⑯ 見劉彥，中國外交史，同註⑪，頁三〇四～三〇六。

萬血本，其遂已矣。

號稱第一等文明國，號稱自由政體之祖國，而其所行如是，直棍騙耳，直盜賊耳……雖然我政府豈惟不問而已，並不知有此事；豈惟不知有此事而已，且並不知其地有中國人；豈惟不知其地有中國人而已，恐並地球上有所此地，而亦不知也。^⑩

當時清廷政府不僅昏庸，其實更已喪失行動與思考的依據。排華與歧視華人的事雖然層出不窮，主權中國無暇顧及，即令民國成立之後的各政府，亦忙於內治。同樣重要地，恐怕是中國人在心態上已不願意接受美國排華的事，此事對中國人的煽動力遠不及二十一條要求，或山東問題，因為主導的是鄰邦日本，故尤其令人激動。更何況，在民國成立前四年，美國又鶴立雞群於泰西各殖民帝國，主動將中國對美國的庚子賠款轉為振興中國教育之用。美國上層領導人對中國種種提掖的表現，比較能夠贏得人心，而為多數中國人所希望看到。其社會上的排華運動，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強化了中國主權的落後印象，這對於美國在政策上以照顧中國的姿態出現時，只會有鞏固的作用。馬克吐溫從可憐的華工聯想到可憐的中國，是最佳註腳：

……沒有人愛中國人，沒有人對他們友善，即使很輕易地可以免去他們的苦難，也沒有人願意做。每一個人、社區以及州。本身的最高當局都齊聲討厥、虐待並迫害這些謙遜的外地人。^⑪

他問到：

德國會不會……對自己的士兵說：「踏平美國，殺戮，寸土不留……踏平這著名的共和國，殺！殺！殺！為我們受到觸怒的宗教開一條路，直通它的內部。」德國會對美國這樣子做嗎？會對英國、法國和蘇俄這樣子嗎？還是僅僅對無助的中國呢？^⑫

伍、主權中國與美國的陰陽調和

二次歐戰爆發以後，中國抗日的情勢有了結構性的轉變，中國政府決定將抗戰的命運與歐戰聯繫起來，並且不再單獨謀求與日本的和局。這個轉變，完全符合中國長久以來期待國際介入中國戰局，主持正義的想法。即至太平洋戰事爆發，更讓中國方面感到機不可失，蓋日本已與美國開戰，美國正式介入中國戰局指日可期，中國立即表示願意作更大犧牲，支持美國領導各國聯合行動，而中國首先同意放棄單獨行動，全力與各國合作。蔣委員長致電羅斯福全文如下：

- 一、最近與日本會談，盡管美國之誠意努力，期以和平辦法，以解決太平洋地區之各項問題；然日本竟對英美發動突襲攻擊。日本此一最近之國際盜匪行為，吾人至感驚異。
- 二、對於美國、英國、澳洲、紐西蘭、加拿大、荷蘭、蘇俄等國對付日本及

註⑩ 習賢德，頁二六二。

註⑪ 同前註，頁四九九。

註⑫ 同前註，頁四九五～四九六。

軸心伙伴，所採取之任何協同之軍事計劃，中國政府決盡全力合作，犧牲在所不計。

三、中國政府已決定對日及其伙伴德意等國正式宣戰。

四、為使協同之行動充分可能，中國政府認為最迫切者，及反侵略陣線之每一國家，應將軸心集團內之每一國家，視為共同敵人。因之，吾人提議，美國對德意、蘇俄對日本同時宣戰。

五、為使戰爭之進行有效和成功，中國政府認為，中、美、英、蘇、澳洲、紐西蘭、加拿大、荷蘭，締結一項軍事同盟，由美國領導，對聯合行動，有統一之指揮。

六、中國政府提議，上述締約國家，不單獨對敵媾和。^④

而羅斯福總統回電之中，似乎是在答覆馬克吐溫：

中國對一個鄰近的侵略者，已英勇抵抗四年有半。中國已喚醒美國對其原則與實際之同情。現在，中國之抵抗侵略已不再孤單，其它被日本威脅，及侵略運動威脅之國家，亦已參加此項抵抗。^⑤

中國信守承諾，立即對日本宣戰，不過其中理由之一，是指控日本「攻擊中國的盟友——英國與美國」。^⑥美國十分體貼地鼓勵中國立刻在重慶舉行聯合軍事會議，^⑦是為清末以來中國境內召開的首次平等會議，羅斯福並請宋子文傳達歡迎中國成為二十六國宣言中的「四強之一」。^⑧但是，中國所企求的主要仍在財政援助，並且明言中國主權所賴之經濟基礎與幣制，^⑨必須靠美援方能支持得住，美國財政部則表示美援可證明中國對美國的信心，「有良好之根據」。^⑩可見，中國對美國的歷史期盼，與美國對中國的歷史同情，因太平洋的戰事而結合。

但是，蔣委員長本人對於中國何以吸引美國之同情與關心，未必深入體會過，因此當美國派來的史迪威將軍，在行止之間表現出美國文明的高傲姿態時，就與作為中國國權最高象徵的蔣介石，產生了個人之間的摩擦。一方面中國地位的提昇，已使過去積弱的怯懦掃除，作為世界四強之一的中國，不甘心再被當成是依賴的、閃躲的國家，在中國對同盟國的犧牲與奉獻逐漸為世人所認可之際，中國感覺到抗戰必將勝利，而且盟軍將缺少不了中國的投入。可是中國方面這種心情的轉變，卻不容易為美國人所察覺。

問題出在史迪威到底是中國戰區的參謀長，還是中印緬戰區的美國統帥。前者是蔣委員長的僚屬，後者則是與他平行的；蔣委員長希望史迪威不要以美國代表的身份，抗拒史氏以參謀身份所接獲的命令。他說，「若有人願意盡力以助我們，而不能給

註④ 郭榮趙，前揭書，頁四二～四三。

註⑤ 同前註，頁四三。

註⑥ 同前註，頁四四。

註⑦ 同前註，頁四六。

註⑧ 同前註，頁四七。

註⑨ 同前註，頁四九。

註⑩ 同前註，頁五一。

我們實際的援助，我們仍然感謝他的努力，但我們卻不願要任何出以傲慢態度的援助」。⑤更重要的，盟軍整體的戰略規劃，中國只能作為旁觀者，重新掀起中國歷史性的自卑感，擔心中國戰區的地位受到忽視。事實上，不僅美援抵華數量只有預期的十分之一，導致中國威脅關閉在華美軍機構，羅斯福雖盡力解釋安撫，並不能平息積怨。梁敬錚對中國當時的不安作了精要的說明：

中國戰場未受平等待遇之例甚多，先歐後亞戰略之決定，中國不得與聞一也；C.C.S. [聯合參謀團]之會議，中國不得參加二也；軍火分配委員會，中國無人代表三也；有關攻日戰略之任何決定，中國從無預商之機會四也；租界器材，改由美軍代表在印控制其分配五也。凡此種種……已如憤火中燒，有觸斯發。⑥

可見，美國人幻想的卑微的中國已經不復存在。當年國民黨北伐有俄國顧問來華指導，從未與蔣發生嚴重衝突，但他對俄國的反感則也是眾所週知。抗戰期間，蔣介石在太平洋戰事之後的頭角崢嶸，容不下屈辱的安排，恐怕所積之怨氣，遠超過梁敬錚所紀錄者，蓋蔣氏是在表現中國之崛起。當年卑微的後殖民中國受人壓迫，事屬當然，也符合近代中國自憐的心態，但抗戰中國已然復興，難道盟國對中國的讚譽都是虛假的嗎？蔣介石事實懷疑，「中國在此戰業中，只是一種工具而已。」⑦可是，美國願意幫助中國，恰是建立在一個抽象缺乏自主能力的印象中國上，假如中國方面表現得如此桀驁難馴，一定大大出人意料，也就在情感上難以慨然接受。換言之，當中國被看成一個抽象的主權的時候，所有女性化的想像都可以與之連結，等到是一個個具體的人在領導中國時，這些女性化的幻想則都無法獲得滿足，蔣介石堅毅的性格，顯然就為美國方面深感不安。

不過，美國方面對中國整體印象，仍然不全是根據中國戰區的實況來判斷，而是依據美國文明先進位置的角度在過濾。太平洋學會所引述的一篇不利於國民政府的報導，就是在以美國文明的標準，決定中國需要什麼幫助：

(一)停止援助蔣委員長；(二)美國高級官員應宣揚我們政府的意願，「中國的民主和統一」；(三)美國戰時新聞處，應該提出「民主為永久的政治制度之價值，以及民主對於對抗極權主義作戰的幫助」，美國戰時新聞處應該承認和鼓勵中國的「自由和進步力量」；(四)我們「應與中國的自由份子」和共產黨保持「友好關係」；(五)應邀宋慶齡前往白宮；(六)「我們應對中共表示興趣和……並公開中國政府對它的「封鎖」；(七)我們應向蔣委員長施以壓力，使他允許美國派員到華北視察；(八)我們應訓練和和裝備各省軍隊抗日。⑧

其中邀請宋慶齡的建議有其深層的含意。這個建議顯然是針對宋美齡訪美，成功激起美國社會對中國的同情之事而設計，或許是希望藉宋慶齡訪美，抬高共產黨的聲

註⑤ 郭榮趙，前揭書，頁六五。

註⑥ 梁敬錚，史迪威事件（台北：商務，民國六十年），頁七四。

註⑦ 同前註，頁七五。

註⑧ 郭榮趙，前揭書，頁六九～七〇。

望。宋美齡訪美成功，剛好彌補了因蔣介石與史迪威的摩擦帶來的不愉快。宋美齡受美式教育，可以說是美國文化在中國的最高代表；但她在美國社會卻成了華人向美國文化學習的象徵；她的女性身份；沖淡了蔣介石的剛猛，也符合美國人對女性中國的幻想。宋美齡的外交活動如此打動人心，是她的多重文化背景，社會位置，與女性角色共同烘托的。親共人士建議邀請宋慶齡訪美，似乎證明了親共與反共的人具有一個共通的前提——女性的，美式的中國才能使美國人心安。

中國的卑微畢竟不是旦夕可以磨滅的歷史記憶，當蔣介石由宋美齡陪伴出席開羅會議時，面對各國最高領袖與將官，中國方面提出的所有軍事建議幾乎均未被採用，但對中國而言，能夠出席開羅會議已經是近代中國領導向來不敢奢望的事，自然難在以英語交談的不熟悉氣氛，與生殊的辭彙中進行辯論，遑論表達個性了。委曲之情不難體會。而在美國方面，對中國意見之不重視仍出自於對中國戰區功能的輕視，照美國參謀本部的意見，「中國既是無力之聯邦，其駐印軍隊又不能發動大規模之攻勢」，所以只能作為輔佐之用，^⑤甚至認為「中國陸軍之戰鬥力，非至一九四六年或一九四七年不能利用」。^⑥

戰爭結束前的雅爾達會議，則更是將中國主權的空洞本質暴露無遺。中國為要維護與美國的友誼，牽制蘇聯對中共的支持，簽下了喪權的密約。這個約定中國未得與聞，只是事後獲通知，說蘇俄將在中國東北要求租界權利與使用鐵路，這無異是清末勢力範圍的復甦。會議期間，羅斯福雖然覺得應與中國商談，但又擔心中國方面會洩密，史達林則建議作成文字，表達出經俄、英、美「三國同意的條件」，並「無必要和中國商討」，羅斯福則同意說服中國。^⑦矛盾的是，中國人個個期待平等新約，與中國國際地位的振興，但為了要維護與美、蘇的表面和諧，撑起中國仍然為美、蘇接納為四強的身段，竟反而同意了中國追求主權所要校正的不平等位置。

中、美兩國合作最愉快的日子，大致是歐戰爆發後到太平洋戰事初期，因為美國幫助中國的許多作法，都讓中國人對美國有期望，覺得值得依賴，而美國人對於中國向來不抱持領土與主權方面的野心，他們對中國的同情，隨著對中國點點滴滴的幫助累積出來，但關於中國這種不成器、低下、靠不住的脆弱形象，也逐漸根深蒂固。中國追求復興的期望，在進入了四強之後一飛沖天，加上蔣介石個人領導風格與肩負的歷史責任，使得中、美之間的關係出現不符彼此期望的焦慮。美國以其超強的位置，決定了中國主權必須在戰爭尾聲中自我出賣。也重新暴露了中國作為一個後殖民時期遲到的主權國家，並不屬於歐美國家組成的主權世界。

陸、結 論

中國的主權是陰性主權，因為主權的建立是被動的，主權的維護具有依賴性，主

註④ 梁敬錚，前揭書，頁二五七。

註⑤ 同前註，頁二五九。

註⑥ 郭榮趙，前揭書，頁三一七。

權的內在是虛弱的，而且為歐美的主權國家當成是工具、交易對象、自然資源與人力的供應地，厥為分裂的、不民主的、受人壓迫的弱勢主權。這個主權地位一方面是中國的後殖民地位所決定的，另一方面是男性化的西方主權實踐所幻想出來的。主權世界必須同時存在陰性主權與陽性主權，否則歐美的主權者彼此之間的擴張傾向，就缺乏了對象。擴張傾向不是主權決定的，而是西方國家追求文明先進地位，建立殖民地的歷史結局，但主權的觀念也改變不了這種擴張傾向。但因此說主權觀念本身是科學現象，則又言過其實，因為主權是用來抵擋別的文化入侵的理由，所以必然會為各個擴張性的文明勢力所運用，相互排斥。以主權為基礎的外交，就必然對於前殖民母國有利，對後殖民的獨立國家不利。

近代中國就是一個後殖民主權的典型，也呈現了一個後殖民、女性化的主權要改變主權地位，轉化主權形象的困境。要謀生與發展，陰性主權的乞求與依賴態度最能博取同情，只是沒有一個國家能刻意扮出這樣的身段。

*

*

*